

候選組別背景與區域得票之分析

——以當選立法會議員的區域性得票為視角

蔡永君 何偉鴻

[摘要] 以2013和2017年立法會當選議員組別背景為視角，利用各組別在不同區域獲得的有效票數計算標準化發生比（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io, SIR），可分析和比較當選組別在各區域的“吸票”能力，瞭解各組別的得票是否具有區域性差異，藉以探討不同社經背景選民在投票取向與候選組別背景上的關係。結果發現，在現時各候選組別政綱相對接近的情形下，不同組別在各區的得票情況大相逕庭，但選民的投票取向與候選組別的背景並未存在很高的關係。

[關鍵詞] 澳門 立法會選舉 組別背景 區域性得票

2017年舉行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第六屆立法會選舉延續了2013年舉行的第五屆立法會選舉的議員人數和分佈比例，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12年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修正案》予以批准和備案後的第二次選舉，修訂後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法》（以下簡稱《選舉法》）使立法會直選和間選議席各增加至14和12席，委任議員維持7名，議員人數合共33名。在議席增加的同時，2013和2017年直選的競爭也越趨激烈，連續錄得破記錄的競選團隊數和候選人數，2013年為20組，共148名候選人；2017年則有24組，共186名候選人。

本文以本屆當選議員的組別性質為視角，分析不同背景參選團隊的區域性得票情況，結合組別的政綱重點，並與上屆（2013年）立法會選舉作比較，藉以剖析當選組別的背景與其總體得票及區域性得票的關係，並瞭解選民社經背景對投票取向的影響。分析兩屆直選中各組別在不同區域的“吸票能力”與“競爭力”，將有助瞭解近年澳門市民與立法會議員（政治精英）的互動關係和政治取態上的變化。

一、2013和2017年立法會直選候選組別背景

本文把立法會議員界定為政治精英。事實上精英的定義在不同學者和不同時期的研究中不盡相同，但從歷史的走向分析，精英的定義已由過往具強烈階級屬性取向轉變為更具社會分層意義的階層屬性，同時，政治、經濟和社會三者的越趨共生關係使政治精英的概念已難以與其他範疇的精英

作者簡介：蔡永君，澳門基金會高級技術員、法學博士；何偉鴻，澳門基金會技術員、管理學博士。

劃出確切的界限。^①然而，在澳門的場景中，真正具影響力的政治精英範圍仍是相對狹隘的，因為在澳門人際交往甚密的結構中，他們的身份往往具有多重性；而澳門立法會議員在來源上已涵蓋了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常委、行政會委員、社團領袖等，正是傳統政治精英的研究對象。

從主要候選人的職業來源、社團背景和服務群體劃分，立法會直選中候選組別可分為七大類，包括紮根和長期服務基層的傳統社團；商界（包括具博彩業背景或具鄉族社團背景）；公職人員；被視為“民主派”的民主民生社團；獨立於傳統工人社團的新興工人組織；專業人士；以及具開展針對青年、老人等服務的社會服務背景人士。其中，前四類的參選組別大部分並非首次參選，且候選人中不少為爭取連任的議員；相對地，後三類的參選組別較為首次參選。

2013年的立法會選舉延續了過往多屆選舉以來的基本板塊分類，較突出的是，該屆直選中有來自青年組織的組別。當選組別中絕大部分的現任立法會議員的候選組別均能成功連任（僅一組的第二候選人除外）。此外，雖然登記選民與投票人數均有所增加，但該屆立法會直選因投票率降低至55.02%（下跌4.89%），使獲取議席門檻票數下降至6,500多票；然而，門檻降低並未對首次參選的組別帶來優勢，當屆獲得議席組別數目保持在9組，且全為2009年屆別獲得議席的組別（表1）。

表1 2013年澳門立法會的直選候選組別

組別	主要候選人	背景#	上屆議員 [^]	首次參選*
第1組：澳門發展新連盟	梁安琪、黃昇雄	博彩業、商界	是	否
第2組：自由新澳門	周庭希、鄭明軒	民主民生社團	否	是
第3組：民主起動	利建潤、林明	新興工人組織	否	否
第4組：澳門公民權益促進會	洪榮坤、馮錦嫻	專業人士	否	是
第5組：民主新澳門	區錦新、蘇嘉豪	民主民生社團	是	否
第6組：同心協進會	關翠杏、林倫偉	傳統社團	是	否
第7組：公民監察	林玉鳳、吳文源	專業人士	否	否
第8組：澳粵同盟	麥瑞權、鄭安庭	商界、鄉族社團	是	否
第9組：新希望	高天賜、梁榮仔	公職人員、土生葡人	是	否
第10組：澳門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促進會 (澳門夢)	張榮發、程樂蓀	新興工人組織	否	是
第11組：親民奮進會	潘志明、何天家	社會服務	否	否
第12組：改革創新聯盟	陳美儀、胡錦漢	博彩業、商界	是	否
第13組：澳門民聯協進會	陳明金、施家倫	商界、鄉族社團	是	否
第14組：群力促進會	何潤生、黃潔貞	傳統社團	是	否
第15組：工人運動陣線	梁石、趙文精	新興工人組織	否	是
第16組：基層監督	李少坤、陳錦光	新興工人組織	否	是
第17組：社會民主陣線	李漫洲、伍錫堯	新興工人組織	否	否
第18組：超越行動	高岸峰、賴文輝	新興青年組織	否	是
第19組：民主昌澳門	吳國昌、陳偉智	民主民生社團	是	否
第20組：關愛澳門	關偉霖、老傑龍	商界	否	否

註：灰階為當選組別；

以總體各候選人的職業、社團背景等作衡量；

[^] 組別內任何候選人為2009—2013屆別的議員將視作為“上屆議員”；

* 以候選組別作劃分標準。

^① 例如，Higley和Burton把政治精英的涵義延伸至在重要的機構或政治運動中佔有戰略位置而在政治決定上具有影響力的人，包括政黨、專業團體、工會、傳媒、利益團體、宗教和其他具權威性和階層等級機構又或是運動組織的領袖。見John Higley, Michael Burton, *Elite Foundations of Liberal Democracy*, U.S.: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6, p. 7; Michael Burton, John Higley,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 Transformation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11, No. 2 (2001), p. 182.

在組別背景上，雖然2017年的選舉與過往多屆的幾大類別相似，但需注意的是，原為同一組別的作了分拆，也首次出現主要針對單一社會議題的參選組別。反之，本屆直選中沒有明確針對青年、老人等社會服務背景的候選組別，因此，具體而言，本屆候選組別可分為傳統社團、商界（主要為鄉族）、公職人員、民主民生社團（民主派）、新興工人組織、專業人士、新興維權組織。

本屆候選組別的增加形成了更激烈的競爭，當選的候選組別所佔總體有效票數由2013年的85.48%略降至84.47%，但今屆當選的門檻需要取得8,348票，較上一屆的6,565票提高了近三成，這應與本屆投票率上升至57.22%（上屆為55.02%），以及增加了近23,000名選民投票相關。而獲得議席的候選組別共12組，大部分為上屆獲得議席或由此分拆的組別（表2），但一些上屆議員的候選組別卻因為門檻的提高而未能連任。

表2 2017年澳門立法會的直選候選組別

組別	主要候選人	背景#	上屆議員 [^]	首次參選*
第1組：新澳門夢（爭雙普選反高官自肥聯盟）	程樂蓀、洪學森	新興基層組織	否	否
第2組：群力促進會	何潤生、邢榮發	傳統社團	是	否
第3組：民主昌澳門	吳國昌、梁博文	民主民生社團	是	否
第4組：公民監察	林玉鳳、張志雄	專業人士、青年社團	否	否
第6組：新希望	高天賜、梁榮仔	公職人員、土生葡人	是	否
第7組：學社前進	蘇嘉豪、陳偉智	民主民生社團	否	否
第8組：澳門民眾協進會	宋碧琪、呂子安	商界、鄉族社團	是	否
第9組：澳門民聯協進會	施家倫、曾志龍	商界、鄉族社團	是	否
第10組：思政動力	葛萬金、António da Conceição Oiveira Lopes	專業人士、公職人員	否	是
第11組：美好家園聯盟	黃潔貞、呂綺穎	傳統社團	是	否
第12組：市民力量	施利亞、庄雪云	商界、鄉族社團	否	是
第13組：民主新動力	區錦新、陳國成	民主民生社團	是	否
第14組：澳門發展新連盟	梁安琪、關偉霖	博彩業、商界	是	否
第15組：傳新力量	林宇滔、甄慶悅	專業人士	否	是
第16組：同心協進會 [@]	李靜儀、梁孫旭	傳統社團	是	是 [@]
第17組：澳門公義	李少坤、梁銀旺	新興工人組織	否	否
第18組：改革創新聯盟	陳美儀、胡景光	博彩業、商界	是	否
第19組：公民一心建澳促進會	洪榮坤、張帆	專業人士	否	否
第20組：澳粵同盟	麥瑞權、鄭安庭	商界、鄉族社團	是	否
第21組：基層之光	林偉駒、區潤鴻	基層公職人員	否	是
第22組：基層互助	黃偉民、張國成	新興工人組織	否	是
第23組：民主起動	利建潤、吳少洪	新興工人組織	否	否
第24組：海一居業主維權聯盟	高銘博、洪清團	新興維權組織	否	是
第25組：博彩員工最前線	周鏄芳、梁汝根	博彩員工	否	是

註：灰階為當選組別；

以總體各候選人的職業、社團背景等作衡量；

[^] 組別內任何候選人為2013－2017屆別的議員將視作為“上屆議員”；

* 以候選組別作劃分標準；

[@] 第一候選人上一屆為間選議員，本屆首次參加直選。

二、候選組別政綱內容分析

本文以選舉管理委員會統一印製的政綱簡介對各組（以背景劃分）作簡要分析，由於選舉管理委員會提供的版面有限（兩版），給予各候選組別平等的政綱宣傳機會，因此可理解為各組別把其最重要的理念或欲宣傳的想法放在選舉管理委員會統一印製的政綱簡介內。

可以看到，從比例來看（表格內的數字表示有關範疇在該背景組別內出現的比例），“民生類別”在各組別中均佔一半或以上，顯示其在各組政綱中所佔的比重較高，鄉族（商界）的政綱側重“民生類別”的議題，而公務員／土生的組別（只有一組）則在內容上以涉及“文教體育及青年”為多，民主派在政綱篇幅上較多關注“政府與行政”，而博彩業（商界）則明顯在經濟議題上着墨較多，並在“社會服務”方面有較大的關注（表3）。

表3 2013年澳門立法會直選候選組別政綱分析

背景 \ 範疇	經濟類別	民生類別	政府與行政	社會服務	文教體育及青年	專業	城市環境	其他
鄉族（商界）	0.20	0.63	0.25	0.40	0.25	0.25	0.50	-
公務員／土生	0.40	0.50	0.50	0.40	0.75	-	0.50	1.00
傳統社團	0.50	0.50	0.50	0.30	0.25	0.50	0.75	0.25
民主派	0.27	0.50	0.58	0.27	0.08	0.33	0.33	0.50
博彩業（商界）	0.60	0.50	0.38	0.70	0.38	-	0.25	-
新興工人組織	0.36	0.45	0.30	0.24	0.15	-	0.40	0.50
社會服務及其他	0.20	0.25	0.50	0.90	0.63	-	0.50	0.75

註：筆者把候選的20組政綱的內容分類為28個類別，並歸類為8大範疇：

經濟類別：博彩業、經濟、勞工與就業、區域合作、人口政策／移民

民生類別：交通、房屋與土地、專營與物價、治安

政府與行政：公共管理、公務員、公共財政、廉政審計

社會服務：醫療衛生、社會保障、老人、婦幼、其他弱勢群體

文教體育及青年：教育、文化、體育、青年

專業：法律、專業

城市環境：城市建設與規劃、環保

其他：政制、動物保護

資料來源：澳門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2013年立法會選舉候選名單政綱概要》（直選）。

2017年在各候選組別的政綱中，“民生類別”的比例也是較重，而本屆“社會服務”在各組政綱的出現頻率也有所增加，大部分的組別有50—80%機率提及有關“社會服務”類別的內容，傳統社團的政綱在“民生類別”、“城市環境”與“專業”的篇幅不低，博彩業（商界）在本屆的政綱中則較多提及“文教體育及青年”的內容。因新興工人組織的組別較多，政綱內容也相對分散，但仍以“民生類別”的內容佔多（表4）。

表4 2017年澳門立法會直選候選組別政綱分析

背景 \ 範疇	經濟類別	民生類別	政府與行政	社會服務	文教體育及青年	專業	城市環境	其他
鄉族(商界)	0.25	0.44	0.19	0.50	0.25	0.38	0.25	0.13
公務員/土生	0.20	0.50	0.50	0.80	0.75	0.50	1.00	0.50
傳統社團	0.40	0.67	0.50	0.73	0.42	0.67	0.67	0.17
民主派	0.33	0.42	0.25	0.60	0.17	0.17	0.33	0.67
博彩業(商界)	0.50	0.50	0.25	0.50	0.63	0.25	0.50	0.25
新興工人組織	0.29	0.43	0.21	0.26	0.18	0.14	0.29	0.21
社會服務及其他	-	-	-	-	-	-	-	-

註：筆者把候選的24組政綱的內容分類為28個類別，並歸類為8大範疇，分類方式見前述。

資料來源：澳門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2017年立法會選舉候選名單政綱概要》（直選）。

同時，筆者整理了各候選組別所派發的宣傳單張，藉以進一步瞭解候選組別的政綱內容和方向。

總體來說，由於整個澳門為單一選區，候選組別政綱傾向“包羅萬有”、“面面俱到”，各組別政綱的差異性並不太突出。2013年直選中各組別提出限制外勞輸入、打擊黑工、落實官員問責制度、加快增建公共房屋等均成為直選組別政綱的重點，而由於候選組別較往屆增加，政綱所涵蓋的範圍亦有所擴大，如兩性平等、青年向上流動、就業公平性、動物權益等議題亦出現於新組別的政綱中。

2017年直選組別政綱中的一個突出之處是多個組別（民主民生社團、新興工人組織、青年社團、公職人員、專業人士背景）均明確提出2019年普選行政長官和逐步減少／取消間選和委任議席，而因應候選組別的背景，當中也有部分組別的政綱具有針對性，例如具博彩業背景的組別在政綱中以較大篇幅關注博彩業發展和從業員的利益；公職人員背景的組別特意獨立列出對公共行政領域議題和公職人員福利的主張；具商界背景的組別則對營商環境、經濟政策等內容較其他組別着墨為多。

相對來說，雖然本屆各直選組別政綱的差異性仍然不高，社會與民生議題（民生類別）始終為政綱的重點，包括房屋、交通、物價等，但各組也致力突出其代表的群體和階層，例如從傳統社團分拆、以婦女團體為背景的候選組別在政綱中強調為婦幼和家庭爭取權益；以代表基層公務員為背景的組別較多着墨公務員的退休保障和基層公務員的權益；候選人全為博彩員工的組別，其政綱內容很大程度針對博彩員工的福利和權利；而以“海一居”事件為連繫而組織的候選組別，其政綱中則反覆強調保障小業主的合法權益。因此，各候選組別政綱的針對性較過往有所加強。由此可見，雖然總體上為爭取更大比例的市民認同，各組別政綱保持相近，但隨着社會利益的分化和日漸複雜多變的社會議題，各組別政綱內容也適多樣化的路向發展，且越趨明顯。

另一個本屆政綱中相對突出的地方是政治類的訴求有所提高，較上屆有所強化，特別是高官問責制和加強政府施政的監督的議題，超過四分之三的候選組別都在政綱中有所提及，而其他包括“普選行政長官”、“增加直選議席”等政治訴求也有約三分之一的候選組別提出，當中，“泛民主組別”（指新興基層或工人組織、民主民生社團）的政治訴求普遍多於其他組別。^①

① 楊佳龍：《第六屆立法會直選組別政綱分析》，《澳門日報》（澳門）2017年10月4日E06版。

三、2013和2017年立法會直選結果的區域性分析

(一) 區域的劃分和特徵

歷史上，自葡萄牙人來澳定居和實施行政管理以來，澳門半島以各居民區內具代表性的教堂所命名的堂區作為澳門政治行政生活中的一個單位，並在一定程度上發揮指引行政管理的功能，^①縱然現時堂區劃分在公共行政或社會管理的實效不大，但在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的統計上仍以堂區作為區域數據的劃分單位，事實上，不同堂區／區域在總體人口特徵、社會構成和經濟發展情況也有相當的差異，形成區域性的特定社經背景（表5）。

表5 澳門各堂區／區域的人口和社經特徵

堂區／區域	特徵
花地瑪堂	<p>是澳門半島最遲開發的區域，由於毗連中國大陸，20世紀70年代末從中國大陸遷徙來澳的廣東和福建籍基層移民大多聚居於此，是澳門半島面積第二大、人口最多的堂區，也是傳統上直選的最大票倉，2016年底（下同）登記選民數達13.6萬人，約佔全澳選民人數近四成半。</p> <p>人口的平均年齡相對較低，而內地出生比例為各區中最高（54.5%，高於全澳總體43.6%的水平）。人口學歷水平偏低，除路環外，該區的小學學歷比例為全澳最高（17.8%），大學學歷比例則是各區中最低（17.3%），但現在其大學學歷水平已較2011年人口普查時大為提高（其時為10.5%）。該區的已婚比例僅低於路環區，為全澳第二高，達65.7%，就業人口中從事博彩業的比例為各區之冠（達26.9%），而從事製造及建築業則僅低於路環區，佔14.7%。</p>
聖安多尼堂	<p>是澳門半島主要的商住和傳統工業區，區內以舊式低層樓宇為主，亦是澳門人口密度最高的區域（124,772人／平方公里），是直選的第二大票倉，佔全澳選民人數四分之一（約7.5萬人）。</p> <p>居民以本澳出生較多（43.5%），學歷水平僅高於花地瑪堂區，15.7%取得小學學歷，22.9%具大學學歷（略低於全澳23.1%的水平）。居住人口中超過三成的就業人口從事批發及零售業；酒店及飲食業；運輸及通訊業的服務性行業。</p>
望德堂	<p>是澳門半島面積最小（0.6平方公里）且人口最少（33,293人）的堂區，其北部和東部是較高級的住宅區，選民人數近2.0萬人。</p> <p>人口老化程度較高，平均年齡是各區之首，65歲以上的人口佔14.0%，50歲以上中老年居民比例也較高（達37.4%）。本地出生人口比例為各區中最高（51.4%，全澳總體為40.8%）。高學歷（大學）人口比例達28.3%，僅低於氹仔區。區內從事金融、教育、醫療衛生及社會福利（專業人士）；以及從事公共行政及社保事務（公職人員）的人口比例為各區之首，是中產人士聚居的區域。</p>
大堂	<p>西部是澳門歷史最悠久的商業區，中部是澳門自20世紀80年代崛起的商業中心區，而南部的填海區（皇朝廣場一帶）則是新興的商住社區，其面積雖是澳門半島各堂區中最大的，但人口密度卻是最少，選民人數約1.9萬人。</p> <p>20—29歲人口比例較高，居民出生地以中國大陸佔多，比例僅次花地瑪堂區和路環。具高中學歷的人口所佔比例最多（30.6%），也遠高於總體水平（26.3%），而具大學學歷的比例也較高（28.1%）。人口從事批發及零售業；酒店及飲食業；運輸及通訊業的服務性行業的就業人口比例較高（35.0%）。以職業身份劃分，該區僱主比例為各區之首（5.5%），遠高於全澳3.1%的水平，可視為澳門中小企業主（中小企佔澳門企業總數約99%^②）的居住集中地。</p>

① 陳震宇：《澳門的行政堂區——兼議市民服務中心的可行區劃》，《行政》（澳門）2008年第1期（總第七十九期），第19—33頁。

② 澳門中小企業協進會網頁，<http://www.sme.org.mo/about/preface>。

續上表

風順堂	<p>是澳門歷史最悠久的區域，區內建築主要是商住混雜的低層樓宇，西面是密集的中低端住宅區，南面則是澳門的高尚住宅區，選民人數約2.8萬人。</p> <p>區內65歲或以上居民佔人口比例的11%，在澳門半島各堂區中僅次於望德堂區，居民平均年齡也僅次望德堂區，人口中以本澳出生居多（44.2%），學歷水平與總體相若，就業人口中從事批發及零售業；酒店及飲食業；運輸及通訊業的服務性行業為各區最高（37.6%），遠高於總體的31.6%。</p>
氹仔	<p>是澳門近年發展最為迅速的區域之一，已成為澳門半島的“衛星城市”，人口超過10萬，選民人數約2.4萬，較上屆的1.6萬增加了48.2%。</p> <p>平均年齡是各區中最低（34.7歲），50歲或以上人口比例也是各區中最低（21.7%）。由於是新發展區域，區內樓宇大部分為中高端的高層住宅群，吸引中產家庭居住，高學歷（大學）人口比例為各區中最高，從事專業領域（金融、教育、醫療衛生及社會福利）和為公職人員（公共行政及社保事務）的就業人口比例僅次望德堂區。部分原因是該區外地人口較多，選民登記比例遠低於其他各區（僅23.7%，總體為47.1%），而各屆投票率亦相對偏低。</p>
路環	<p>原是澳門的“市肺”，開發程度最低，然而，隨著石排灣公共房屋群的落成，人口由2011年的4,200多人倍增至2016年的26,000多人，但選民人數僅約4,500人。</p> <p>人口中65歲以上的比例為各區中最高（14.5%），遠高於總體的9.1%，中國內地出生比例較高（45.6%），小學學歷比例為各區中最高，但具大學學歷比例與總體水平持平，已婚人口的比例也是全澳最高。就業人口中約六分之一從事製造業及建築業，位列各區首位。</p>

資料來源：選民數據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選民登記網站，<http://www.re.gov.mo/re/public/index.jsf>；人口特徵、出生地、婚姻狀況和就業分佈見《2016年中期人口普查》；地理面積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地圖繪製暨地籍局網站，http://www.dscg.gov.mo/cht/knowledge/geo_statistic.html，其他描述參見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澳門：澳門基金會，2005年。

（二）研究方法

數據來源方面，2013年澳門立法會各直選組別在各投票站的得票數據來自《2013年選舉活動綜合報告》，2017年則因立法會直選官方網站僅公佈以澳門半島、氹仔和路環劃分的各組得票數，本文以筆者在選舉日翌日凌晨（2017年9月18日）於澳門、氹仔及路環各投票站門外公佈的各組得票數據作為相應的得票計算。^①由於路環監獄和澳門理工學院體育館票站投票人士分別為在囚人士以及間選選民，其投票取向與選民社經背景及人口特徵關係不大，故不列入本文的分析。

本文採用標準化發生比（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io, SIR），^②分析2013及2017年立法會選舉結果。SIR主要是評估某一個特定事件在整體人口發生機率與整體預期平均發生機率之間的一個比較值，一般用於評價國家或地區某一疾病發生機率是否處於一個正常值。Tina Žagar、Vesna Zadnik及Maja Primic Žakelj在探討斯洛文尼亞乳腺癌發生機率時指出，由於斯洛文尼亞是由不同直轄市組成，各直轄市發生乳腺癌案例通常較小，難以運用統計手段探討其病發機率的空間性差異；但如從整體或較大行政區域的層面（aggregated or large administrative region）進行探討，則會忽略不同區域之間的人口特徵和環境、社經因素差異對乳腺癌發生的影響。因此，通過把相似的人口特徵、地理位置鄰近的直轄市乳腺癌案例進行組合（geocoded），列出各直轄市組合／群組區域（cluster）的人口特徵和環境因素差異，將能從區域性角度瞭解環境因素差異對乳腺癌病

① 經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和終審法院對廢票的覆核，澳門半島的有效票數與作者在票站外公佈所收集的數字相差39票，僅佔總有效票數的0.02%，各候選人的排名不變，也不會對研究的分析結果構成明顯的影響。

② David Clayton, John Kaldor, “Empirical Bayes Estimates of Age-Standardized Relative Risks for Use in Disease Mapping,” *Biometrics*, Vol. 43, No. 3 (1987), pp. 671–681.

發率的影響，^①計算地區標準化發生比（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io）將突顯區域病發率之間的差異。本研究將參考Tina Žagar、Vesna Zadnik及Maja Primic Žakelj的研究，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地圖繪製暨地籍局劃分的澳門半島堂區（包括花地瑪堂區、聖安多尼堂區、望德堂區、大堂區、風順堂區）以及氹仔和路環，按票站的地理位置劃分成7大堂區。上文所述澳門7大堂區的人口特徵，無論在人口規模大小、人均年齡、職業、收入、學歷、出生地等因素均存在差異性，並將影響各組別在堂區得票的情況，從而反映各候選組別在各堂區“吸票”能力的差異。

本文根據立法會選舉官方網站資料，把2013年（剔除監獄的票站^②）和2017年立法會直選中30和34個投票站（剔除監獄及澳門理工學院體育館的票站^③）分別歸入7個區域，整合各組在不同票站獲得的有效票數（下稱“區域得票數”），對上述兩屆當選組別的得票情況進行整體及區域性分析。^④根據2009、2013和2017年三屆的立法會選舉投票站分佈，其主要依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的統計分區分佈，即基本每一統計分區設有一個或以上的票站，^⑤而澳門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按照選民申報的常居住址，為選民安排附近的票站投票，而部分處於區域邊界的投票站，將按其覆蓋的範圍、該區投票站數量和選民人數作適當調整，即地理位置處於某一堂區的票站，另一堂區的選民也可能在此投票。^⑥

SIR值計算方面，首先將直選中各當選組別的堂區得票數字，即區域得票數作為觀察值（observed value）。由於2013和2017年的澳門立法會直選分別有20及24個組別參與；假設各組別獲取選票機率相同的情形下，堂區有效得票的平均值（堂區有效得票總數除以參選組別數），就是各組區域得票的預期值（expected value），通過計算各當選組別區域得票數（觀察值）與堂區有效得票的平均值（預期值）比例，將能得出標準化發生比（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io，SIR）。^⑦如堂區得票SIR值高於1，即該組別在某堂區得票高於整體平均值，“吸票”能力較其他組別相對較高，SIR數值越高，即表示組別在該堂區選情越好，競爭優勢越明顯。相反，如堂區得票SIR數值少於1，即組別未能獲取該堂區整體平均值的票數，“吸票能力”相對較弱。本研究將按當選組別背景劃分為鄉族（商界）、公務員／土生葡人、傳統社團、民主派、博彩業（商界）及專業界別作闡述探討。

① Tina Žagar, Vesna Zadnik, Maja Primic Žakelj, “Local 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io Estimates and Comparison with Other Mapping Methods for Small Geographical Areas Using Slovenian Breast Cancer Data”, *Journal of Applied Statistics*, Vol. 38, No.12 (2011), pp. 2751–2758.

② 由於監獄內投票的均為在囚人士，其投票取向與所在的區域（路環）的社經背景或總體人口特徵等關係不大，而2013和2017年監獄內的投票人數僅為250和226人，佔投票總人數不足0.3%，因此對本研究的總體分析結果影響甚微，可忽略不計。

③ 由於2017年澳門立法會選委會安排所有符合間選的直選選民，統一在澳門理工學院體育館進行直選和間選投票，這與路環監獄的情況相同，這票站佔投票總人數約為3.1%，對本研究的總體分析結果影響較輕微，可忽略不計。

④ 由於選民登記和選舉管理委員會的官方網站沒有公佈完整以區域及人口特徵劃分的選民登記數目，因此本研究運用《2016年人口普查》中“區域人口”部分的人口特徵和社經背景作資料來源。

⑤ 統計分區是以堂區的範圍作細部劃分，澳門半島五個堂區分為17個統計分區。氹仔和路環則分別劃分為5個和1個統計分區。

⑥ 此可視為本研究在統計上的一個限制。

⑦ David Clayton, John Kaldor, “Empirical Bayes Estimates of Age-Standardized Relative Risks for Use in Disease Mapping,” *Biometrics*, Vol. 43, No. 3 (1987), pp. 671–681.

四、結果分析

本屆登記選民人數增加了30,986人，有效票數由上屆146,518增加至172,589，經歷“天鴿”風災後，本屆立法會直選總體投票率上升至57.22%，反映已登記選民的投票意欲有所上升。本屆直選組別“同心協進會”以8,348張有效選票獲取最後一個直選議席，較上屆的議席門檻增加1,783張有效選票。本屆共有12組直選組別取得議席，較上屆增加了三組。上屆票源集中在三個組別，分別為“澳門民聯協進會”、“澳粵同盟”和“群力促進會”，上述三組得票率均超過10%，而本屆並沒有一個組別得票率高於10%，顯示各組別競爭力較上屆平均。本屆獲得最多得票數的三個組別依次是“澳粵同盟”、“同心協進會”和“澳門民聯協進會”。

本屆選情方面，通過計算組別得票率的標準差，可反映該屆選舉的競爭程度。同時，選舉競爭程度也影響着組別獲取議席門檻的SIR值。直選組別得票率的標準差數值越低，顯示選舉競爭程度越高，獲取議席的門檻SIR值亦會越高。本屆組別得票率的標準差值為0.03，相較於上屆（0.05）下降0.02，反映本屆各組得票較上屆平均。選舉競爭程度提高下，本屆直選組別整體SIR值需要達到1.16或以上（參選組別需要獲取比平均選票7,193高出16%或以上）才能取得議席，較上屆SIR的門檻值（0.90）大幅提高。

本研究對澳門立法會選舉當選組別的得票進行分析，^①並比較本屆和上屆當選組別得票率、整體和區域性SIR值。在剔除參選組別和選民增加等因素下，整體得票SIR值，即組別實際得票與平均得票之間的比例，可反映各當選組別整體競爭力的變化。而從總體SIR值來看，可見較長年資的社團如傳統社團、鄉族（商界）的候選組別，其在競爭優勢上相當明顯（較新興工人組織）。

（一）整體分析^②

本屆各當選組別整體得票的SIR值均較上屆平均，與上屆票源較為集中於鄉族（商界）組別的情況有所不同。本屆最高得票組別“澳粵同盟”，其SIR值為2.39，較上屆增加0.17，顯示該組別的“吸票”能力較上屆有所提升，但與上屆以福建籍候選人為背景的“澳門民聯協進會”所取得的得票SIR值（3.61）仍有一定的距離。本屆該組別分拆為“澳門民聯協進會”及“澳門民眾協進會”，並由施家倫和宋碧琪分別作為第一候選人，選舉結果顯示這兩組當選組別整體得票SIR值總和（3.47）較上屆3.61為低，基於票源相對分散的情況下，“吸票”能力較上屆有所下降，導致整體當選的鄉族（商界）組別得票較上屆減少約5%。

傳統社團方面，代表勞工及基層的“同心協進會”，在三個屬傳統社團組別中得票最高，整體得票率達到9.67%，得票SIR值由上屆的1.63提升至本屆的2.32，並取得兩個議席，但得票率仍較上屆的“群力促進會”為低。

上屆“群力促進會”第1及第2候選人分別來自“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和“澳門婦女聯合總會”，而本屆上述兩個社團則分別組閣參選（“群力促進會”和“美好家園聯盟”），在票源分散的情況下，“群力促進會”和“美好家園聯盟”得票率分別為7.15和5.50%，但兩組得票率總和高於上屆，其得票SIR值分別為1.72和1.32，各取得一個議席，議席數與上屆相同。而作為澳門公

^① 本研究對象為當選組別，因此下表的研究結果僅顯示當選組別的整體和各區域得票情況。

^② 整體性分析包括路環監獄和澳門理工學院體育館票站的有效票數。

務員和土生葡人族裔利益代表的組別“新希望”，雖然整體得票率及其SIR值均有所上升，但由於本屆議席門檻提高，該組別只能取得一個議席。

本屆民主派共有三個組別取得議席，分別為“民主新動力”、“民主昌澳門”和“學社前進”。民主派當選組別整體得票率總和較上屆增加4.2%。以區錦新為第一候選人的“民主新動力”（上屆為“民主新澳門”），整體得票率較上屆錄得輕微增幅，但從選舉競爭力而言，其得票SIR值則較上屆增加0.38。另一個澳門傳統民主派代表吳國昌為第一候選人的“民主昌澳門”，整體得票率和SIR值均有所下降。而上屆“民主新澳門”第二候選人蘇嘉豪，本屆以“學社前進”第一候選人參與直選，並成功取得一個議席，擴大了民主派的選票來源。

博彩業（商界）組別方面，本屆只有“澳門發展新連盟”獲取一個議席，擁有商界背景組別獲得議席數目較上屆減少一席，當中，“改革創新聯盟”未能獲取足夠票數連任。最後，本屆擁有專業界別背景且當選的組別為“公民監察”，其得票率由上屆3.57%躍升至5.56%，成功獲得一個議席（表6、7）。

表6 2013年澳門立法會直接選舉當選組別得票率（按得票順序）

組別	第13組 澳門民聯 協進會	第8組 澳粵同盟	第14組 群力促 進會	第9組 新希望	第1組 澳門發展 新連盟	第6組 同心協 進會	第19組 民主昌 澳門	第5組 民主新 澳門	第12組 改革創新 聯盟
背景	鄉族 (商界)	鄉族 (商界)	傳統 社團	公務員/ 土生	博彩業 (商界)	傳統 社團	民主派	民主派	博彩業 (商界)
整體得票率	18.04%	11.09%	10.79%	8.96%	8.94%	8.16%	7.50%	6.02%	5.98%
整體SIR	3.61	2.22	2.16	1.79	1.79	1.63	1.50	1.20	1.20

表7 2017年澳門立法會直接選舉當選組別得票率（按得票順序）

組別	第20組 澳粵 同盟	第16組 同心協 進會	第9組 澳門 民聯協 進會	第6組 新希望	第2組 群力 促進會	第13組 民主 新動力	第14組 澳門 發展新 連盟	第8組 澳門 民眾協 進會	第3組 民主昌 澳門	第4組 公民 監察	第11組 美好家 園聯盟	第7組 學社 前進
背景	鄉族 (商界)	傳統 社團	鄉族 (商界)	公務員 /土生	傳統 社團	民主派	博彩業 (商界)	鄉族 (商界)	民主派	專業	傳統 社團	民主派
整體得票率	9.97%	9.67%	8.62%	8.33%	7.15%	6.59%	6.05%	5.85%	5.84%	5.56%	5.50%	5.34%
整體SIR	2.39	2.32	2.07	2.00	1.72	1.58	1.45	1.40	1.40	1.33	1.32	1.28

（二）組別背景與區域性分析

各當選組別區域性得票SIR值，即組別在某一堂區實際得票與堂區平均得票之間的比例，可反映各當選組別在該堂區“吸票”和“競爭能力”。同時，各堂區有效票佔總體比例將突顯該堂區對各參選組別的重要性。在剔除路環監獄和澳門理工學院體育館票站的有效票數後，本屆花地瑪堂區佔總有效票數比例接近一半（47.06%），與上屆比例相若，該堂區成為了各參選組別的“必爭之地”。不同當選組別在各堂區的得票SIR值的差異，也正好說明了區域因素對各組票源有着不同的重要性。

在花地瑪堂區，除了“美好家園聯盟”在各當選組別中的SIR值低於1（即區域的平均值）

外，其餘當選組別SIR值均大於或等於1。其中擁有較強烈鄉族背景的三个組別（“澳粵同盟”、“澳門民聯協進會”、“澳門民眾協進會”）在該堂區的得票SIR值分別為2.47、3.06及1.95，相對上屆而言，“澳粵同盟”在該堂區得票SIR上升0.18；相反，擁有福建鄉族背景的“澳門民聯協進會”和“澳門民眾協進會”，該區得票SIR值總和較上屆雖然減少了0.11，但仍然成為其重要的票源地。

另一方面，“澳門民聯協進會”和“澳門民眾協進會”在望德堂區和風順堂的得票SIR值均少於1，其中“澳門民眾協進會”在上述兩個堂區得票較平均值少約30%，相比上屆“澳門民聯協進會”，本屆福建鄉族背景的當選組別在上述堂區的吸票能力有所下降；而“澳粵同盟”在各堂區的得票SIR值，除了路環區外，其餘與上屆的差別不大。

具公務員和土生背景的“新希望”，在兩屆的選舉中，其票源也相對集中於望德堂區和氹仔區，以本屆為例，其得票SIR值分別達2.75和3.45，相對地，其本屆在花地瑪堂區的“吸票”能力有所減弱，SIR值由2013年的1.44下降至2017年的1.19，是當選組別中在該區的SIR值排行“尾二”。

傳統社團代表組別的“同心協進會”、“群力促進會”及“美好家園聯盟”在票源集中地的花地瑪堂區的SIR值分別為2.11、1.69和0.98，“同心協進會”在該堂區得票SIR值較上屆提高，其餘堂區得票SIR值均高於1.5，其中聖安多尼堂、望德堂和風順堂得票SIR值皆高於2，各堂區的“吸票”能力較上屆均有所上升。“群力促進會”在路環區得票SIR值高於2，而其餘堂區得票SIR值處於1.2至1.8之間，整體各堂區得票SIR值均較上屆為低。另一組“美好家園聯盟”則在傳統票倉花地瑪堂區未能取得堂區平均票數（低於1.00），而在望德堂和路環，其區域得票SIR值均高於2，顯示上述兩個堂區為該組的票源集中地。

傳統民主派組別“民主昌澳門”和“民主新動力”，本屆在花地瑪堂區得票SIR值分別為1.37和1.79，“民主新動力”在該堂區得票SIR值較上屆有所上升外，其餘各堂區SIR值亦高於上屆，成為民主派組別得票最高的組別；相反，“民主昌澳門”雖然在花地瑪堂區的得票SIR值與上屆相若，但其餘各堂區SIR值卻略有下降；最後，“學社前進”除了路環區以外，其餘各堂區，包括花地瑪堂區的SIR值均高於1，顯示其“吸票”能力相對較平均。

本屆只有一組擁有博彩業（商界）背景的組別“澳門發展新連盟”獲得直選議席（一個），該組除了路環區外，其餘各堂區包括票倉花地瑪堂區的得票SIR值均有所下降。最後，形象為專業背景的組別“公民監察”，本屆成功獲取一個議席，該組在氹仔和望德堂的得票SIR值分別為2.19和1.94，反映該組在上述堂區的選情具有較大的優勢，而在傳統票倉花地瑪堂區，其獲得的票數達區域平均數（1.00），遠較上一屆該區的SIR值（0.48）大幅提升，成為獲取議席的關鍵（表8、9）。

表8 2013年立法會直接選舉當選組別各堂區SIR值

堂區	有效票數比例	第13組 澳門民聯 協進會	第8組 澳粵同盟	第9組 新希望	第14組 群力促 進會	第6組 同心協 進會	第19組 民主昌 澳門	第5組 民主新 澳門	第1組 澳門發展 新連盟	第12組 改革創 新聯盟
		鄉族（商界）		公務員 ／土生	傳統社團		民主派		博彩業（商界）	
花地瑪	44.11%	5.12	2.29	1.19	1.87	1.51	1.38	1.29	1.81	0.97
聖安多尼	27.21%	2.64	2.50	1.84	2.45	1.99	1.47	1.11	1.70	1.30
望德堂	7.83%	1.85	1.89	2.75	2.54	1.57	1.76	1.17	1.81	1.48
大堂	4.71%	2.70	1.66	2.54	2.40	1.27	1.70	1.15	1.76	1.45
風順堂	9.33%	2.01	2.34	2.16	2.21	1.71	1.75	1.17	2.15	1.44
氹仔	6.42%	2.49	1.21	3.45	2.17	1.27	1.66	1.16	1.54	1.31
路環	0.38%	2.09	1.44	2.56	2.92	1.01	1.30	1.34	0.69	3.03

表9 2017年立法會直接選舉當選組別各堂區SIR值

堂區	有效票數比例	第20組 澳粵 同盟	第9組 澳門 民聯協 進會	第8組 澳門 民眾協 進會	第6組 新希望	第16組 同心協 進會	第2組 群力促 進會	第11組 美好家 園聯盟	第13組 民主新 動力	第3組 民主昌 澳門	第7組 學社 前進	第14組 澳門 發展新 連盟	第4組 公民 監察
		鄉族（商界）			公務員 ／土生	傳統社團			民主派			博彩業 （商界）	專業
花地瑪	47.06%	2.47	3.06	1.95	1.44	2.11	1.69	0.98	1.79	1.37	1.08	1.40	1.00
聖安多尼	24.79%	2.76	1.18	1.00	2.19	2.70	1.67	1.47	1.53	1.43	1.37	1.42	1.51
望德堂	5.44%	1.88	0.84	0.65	3.25	2.10	1.48	2.00	1.33	1.63	1.56	1.55	1.94
大堂	4.68%	1.95	2.02	1.24	2.75	1.69	1.40	1.70	1.26	1.40	1.63	1.68	1.46
風順堂	8.51%	2.84	0.81	0.75	2.36	2.49	1.78	1.22	1.46	1.58	1.65	1.76	1.47
氹仔	7.77%	1.28	1.46	0.97	3.39	1.73	1.24	1.66	1.36	1.48	1.75	1.33	2.19
路環	1.76%	2.96	2.11	1.95	1.88	1.59	2.65	2.16	1.98	0.98	0.96	1.02	0.94

五、選舉結果的啟示

透過對當選立法會議員組別得票進行區域性分析，可見候選組別的背景與區域因素對各組別的選情有着不同程度的影響。上述兩屆立法會選舉中所有的當選組別，其區域得票SIR值大小可反映組別之間“吸票”能力的差異；而按組別背景性質劃分，特別是具鄉族和公職人員背景組別，在某一區域的得票兩屆均相對突出。因此，結合區域社經背景特徵和相關組別的政綱，可初步勾勒出不同組別與選民投票意向之關係。

一般來說，花地瑪堂區被認為是澳門基層市民聚居的區域，也是傳統社團開展民生和街區工作的重點區域，然而，從區域性得票角度分析，近兩屆具鄉族（商界）背景的組別在花地瑪堂區具有很高的“吸票”能力，其SIR值介乎1.95至5.12；而傳統社團在該區的SIR值則普遍低於2，雖然2017年選舉中傳統社團在花地瑪堂區的SIR值有所提高，但已很大程度上反映傳統社團原來以代表勞工與基層利益的優勢已逐漸減退，同時，在澳門經濟發展快速下，中產家庭的增加對傳統社團的選情構成一定影響，例如本屆從“群力促進會”分拆出來，以婦女聯合總會為社團背景的“美好家園聯盟”，其在相對較多中產人士和企業主居住的望德堂區和大堂取得較佳的成績。

另外，雖然從事博彩業的勞動人口較多居住於花地瑪堂區，而部分具博彩（商界）背景組別也在政綱中突出對博彩從業員利益的關顧，但未有在該區獲得明顯的得票優勢。若以得票SIR值排序，本屆當選具博彩業背景的組別僅在12組中排行第八。

值得注意的是，縱然兩屆直選中當選組別不少具有商界背景，但他們均在政綱或宣傳上較少提及商界利益，當中，鄉族（商界）背景組別在政綱中突出對民生議題的關注，注重開展社會民生服務，關注弱勢社群的利益，也在財政支源上傾向關懷老弱，如其中一個鄉族社團持續多年贈予長者敬老金和禮品包，進一步淡化其商界背景的色彩。而具有鄉族或族群背景的組別，他們並沒有在政綱和宣傳上強化有關元素，反之致力吸納不同鄉族和群體選票。例如在候選人中加入來自廣東和年輕的專業人士。

普遍認為，中產和年輕選民對民主派的選情相對有利，而從本文區域性得票分析來看，相關組別在各區的SIR值相對平均，其中“民主昌澳門”一組在較高本地出生和專業人士比例的望德堂和氹仔區確有一定的優勢，但另一組“民主新動力”則在花地瑪堂區取得不俗的成績，而“學社前進”則在風順堂區和氹仔區取得較好的成績，可見縱使源自相似背景或政綱內容接近，但其區域性得票卻有相當的差異。

而具公職人員和土生葡人背景組別，其政綱中大量篇幅針對公職人員的權益，中葡雙語更反映其對葡裔人士的重視，在得票上也傾向獲得中產和年輕選民支持；兩屆選舉中該組別在望德堂區和氹仔得票相對突出，氹仔區域得票SIR值高達3.39（2017年）和3.45（2013年），而在相對較多土生葡人居住的大堂區，也取得較佳成績。

總括來說，雖然本屆的當選組別在取得議席數目分佈上有一定的變化，但整體兩屆選舉當選組別在區域性得票分佈呈現相對穩定性，2017年的選舉中，隨着路環石排灣公屋群和大型私人屋苑落成選民人數大幅上升，但因大部分遷移至石排灣公屋群與大型私人屋苑的選民未有及時更改地址，路環的有效票數佔整體仍相對很低（由2013年的0.38%提高至2017年的1.76%），若未來其能成為一個新興票倉，將或對各組區域性得票產生“洗牌”效應。

再者，在現時各候選組別政綱仍然相對接近的情形下，本文從實證角度分析當選議員的組別背景和區域性得票分佈，發現選民投票取向與組別性質背景因素並沒有存在很高的關係性，相似背景的組別在不同區域的票數差異不低，體現選民投票取向相對較重視候選人的過往政績；^①以及澳門華人以政治參與為手段，以期達致改善個人物質生活為目的之傳統現實觀政治文化取向，^②但在社會利益日益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情形下，以及各組別也較過往提出更多政治性的訴求，選民投票的意向和目標是否能長期保持穩定性，值得進一步的關注和研究。

[責任編輯 陳超敏]

① 例如在2005年進行的兩次電話問卷調查顯示，市民在選擇立法會候選人時的考慮因素當中，過往政績均在各項因素中排第二位，見香港大學民意調查計劃，“澳門地區定期民意研究合作計劃”之澳門立法會選舉及市民置業（2005年4月25—30日）；“澳門地區定期民意研究合作計劃”之澳門立法會選舉及公共服務事業調查（2005年8月29—9月1日），<http://hkupop.hku.hk/>。

② 余振、劉伯龍、吳德榮：《澳門華人政治文化》，澳門：澳門基金會，1993年，第52頁；余振、婁勝華、陳卓華：《澳門華人政治文化縱向研究》，香港：三聯書店，2011年，第71頁。